



◎ 李乐曾 / 著

德国对华政策中的 同济大学 (1907-1941)

德国科学与中国精神文化是两国交流中最高贵的交
换品，同济站在引入德国学术与文明的最前列。

DEGUODUIHUAZHENGCEZHONG
DETONGJIDAXUE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 李乐曾 / 著

德国对华政策中的 同济大学 (1907-1941)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以德国对华政策为框架阐述 20 世纪初以来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发生和发展,并以此为主线对同济大学与德国关系的前期历史进行考察和梳理。

上海德文医工学堂的筹建背景及其后由中国人接办等重大转折,在本书中都有详实的记录和重点阐述。对德中双方保持同济德国特征的出发点、方法、政策手段和所作出的努力,本书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本书内容涉及德国对华政策、德国对华文化政策、中德关系史、中德科技文化交流史、中国教育史和同济大学史,可供相关研究人员、同济大学师生及校友等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李乐曾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608-3418-4

(百年同济文史书系)

I. 德… II. 李… III. ①同济大学—校史—(1907—1941)

②文化事业—对华政策—研究—德国 IV. G649.285.1 G151.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1190 号

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

李乐曾 著

责任编辑 林梅英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一非设计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印 数 1—1100

字 数 530 000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3418-4/G·351

定 价 5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百年同济文史书系

编委会

主 任 周家伦 万 钢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洁民 万 钢 马锦明 王伯伟 吕才明

李永盛 李国强 杨东援 陆敏恂 陈小龙

周祖翼 周家伦 姜富明 赵建夫 黄自萍

董 琦

总 编 辑 陆敏恂

副总编辑 黄昌勇 端木怡雯

总 序

自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出现后,大学越来越成为知识界的焦点。

社会有了大学,似乎就有了生命的动能。大学是理念的制造者、思想的策源地、自由的吸氧吧,大学是学术的交流道、律法的裁判者!一句话,是人、社会、国家的设计大厦。

那么,由谁设计这复杂而伟大之厦呢?当然是人,是国家。如此一来,大学就成了一个民族循环教育的起点与终点。就起点而言,大学仿如木工部、翻砂间或炼钢厂,把从大山里锯来或挖来的材料或矿石,筛、选、模、炼,按照物之性与民之需,经过种种条件的化合、聚合或汇合,激起它们蜕变的激情与渴望……就终点而言,大学又仿如越野的跑道,高翔的飞机,远航的轮船——跑道寂寞了,终点诞生了冠军;飞机降落了,扶梯上升起希望;轮船疲惫了,汽车却开始狂奔!也许在一个遥远的远方,拱起了一架桥,耸起了一座楼,亮出了一道新公式,生长出一道新课题……所有的起点都能到达,而所有的终点,都可以再出发……我们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大多数人把起点和终点都放在大学之道上,在杰出的理念、思想、自由、学术和一切律法上走过来或走开去,那这个国家一定就被大学化了。大学与人、与国家之间,就会出现富有魅力的和谐互动。

同济大学生长了一百年,与中国不少大学一样,有许多共性:前50年在列强、军阀、贫困和战争中煎熬;后五十年经历了院系调整、“左倾”厄运、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历史之轨驭空而行,同济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这是德国医生宝隆博士(Dr. Erich Paulun)力主创办的,有着德国文化和学术、尤其是医工传统深远影响的大学,教学、研究、实践相统一的学风,崇尚自由但又务实与一丝不苟的德国精神至今流动在同济人的血液中。其二,

同济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受害者。1917年法国总捕房占领校舍,要解散同济,学校几乎夭折。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同济亡命于西迁之途,有时数路并进,风雨兼程,且车且船且步,行程二万多里。更恐怖的是侵略者的一路轰炸,同济在大曲折中完成大生存,其抗战救国的自我牺牲、同舟共济,相信是困难大学中最为艰难者之一。其三,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院系大调整前,同济已有了医、工、理、法、文五大学院,还有附中、高职、医院等辅助性教学机构。调整后,以土建单科为主,医学、测量、造船等优势学科以及已经颇具气象的法学、文学、哲学调整到其他高校,洪堡理想中的大学自由、哲学人文的基础地位及学科分类和科学统一原则等受至到了挑战。当然同济的土建等学科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但代价和遗憾也留给了后五十年的同济。

20世纪80年代开始,同济恢复了对德联系;90年代开始,同济再向综合性大学长征;21世纪校庆100周年之际,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已扬帆出海!码头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吴淞与双溪,岸线也不再是当年的狗街和李庄,而有更高更远的银河在闪耀,那正是我们星槎的航向所在!

“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一路的航程至艰至险,同济百年历程,留下多少人物、故事和学术的波痕……在百年校庆之机,我们启动百年同济文史书系,就是请我校的学者、作家、报人和编辑,或编或著,再现百年航程的点点滴滴,将一个世纪的苦难、挣扎与奋斗用不同的体裁和文字表达出来,让读者重温一所大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曲折与辉煌。

我们以为,同济不仅是同济的,同济是上海的,更是中国和世界的。百年校庆之后,我们将继续把这一书系延伸拓展下去,看成是同济人文的脉搏、薪火的传递。

百年同济文史书系编委会

2007年4月8日

前言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通常包括传统外交、对外经济政策和对外文化政策三个方面。欧美国家因其经济、军事和科技的先期发展,早在 19 世纪已开始在对外政策中注意通过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的交流及输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文化关系形式予以体现。第一,以学术为媒介进行文化间的互动,这主要是在国外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在德国招收外国大学生等,它涉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的文化关系。由于德国和这些国家在教育 and 科技水平方面,在文化和宗教背景方面具有共同性和相似性的特点,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是一种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第二,德国在国外建立学校、医院及慈善机构,它更多地涉及到德国与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关系,主要表现为在武力入侵和经济扩张背景下的所谓强势文化的单向输出。

19 世纪末德国在中国实施强权政治为德国文化直接通过官方措施进行输出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德国强占胶州湾并对其实施“模范殖民地”政策和 20 世纪初德国在中国建立多所宣传学校,拉开了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序幕。至 1941 年,这一政策在威廉二世、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政权三个历史时期经历了起始、中断、恢复、变化直到终止的曲折过程。

德国学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多角度地对近代以来的德国对华文化政策进行研究,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了多项成果,但研究重点几乎都集中于 20 世纪初至魏玛政府前期,缺少时间跨度大的历史纵向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则毫无例外地以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教育活动为对象。

同济大学的前身——上海德文医学堂是德国在近代中国最早筹建的宣传学校之一,它不断延续的德国特性使它成为研究 20 世纪前 40 年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对象。将同济大学作为一个主体进行中德文化关系的纵向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整个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对认识这所大学在两国文

化交往中的特殊性和代表性也不无裨益。作为一个初步尝试,本书旨在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19 世纪末以来的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各个时期的调整,决定了对华文化政策的发生、变化和最终走向。基于这一认识,本书采用从宏观到微观逐步推进的方法,展示中德关系各个时期德国文化政策影响下的同济大学的历史。第一层次以德国对华政策为大背景,阐明各时期对华文化政策的动态;第二层次以对华文化政策为出发点,详述各时期同济大学与德国关系的演变。

本书参考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表的各种专著和文献资料。除了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之外,本书另一个重要的成果是运用了大量未刊发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最新发掘的中、德文原始档案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也为诸多史实的阐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附录中的上海德文医学堂建立以来至 1941 年止同济大学的德国教师简历。这些教师的经历虽然带有不同时代的各种印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是德国对华文化政策自觉或不自觉的执行者,他们的活动在同济大学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科技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济大学正在续写与德国密切合作和交流的历史,在建校百年之际奉献这部研究成果,既表示祝贺,也以此作为一个纪念。

作者

2007 年 4 月

目次

总序	1
前言	2
第一章 20 世纪初的德国对华政策	(1)
第一节 从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	(1)
第二节 “样板殖民地”与“门户开放政策”	(6)
第三节 德国对外及对华文化政策的初始	(12)
第四节 克纳佩与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实施	(17)
第二章 上海德文医工学堂的筹划与开办	(27)
第一节 宝隆与宝隆医院	(27)
第二节 上海德文医学堂的筹办	(32)
第三节 上海德文工学堂的筹办	(41)
第四节 初创时期的德文医学堂	(51)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文医工学堂的危机	(63)
第一节 威廉时代后期的德国对华政策	(63)
第二节 贝特曼-霍尔维克的对华文化方针	(65)
第三节 “三·一七”事件前后的德文医工学堂	(76)
第四章 魏玛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同济地位的提升	(92)
第一节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对华政策	(92)
第二节 不追求“政治目标”的对华文化政策	(103)
第三节 从医工专门学校到大学地位的确立	(111)
第四节 关于同济医科的发展问题	(125)
第五章 德国对华文化政策调整中的国立同济大学	(134)
第一节 同济大学从私立到国立的转变	(134)

第二节 德国对国立同济大学的政策	(152)
第三节 “一·二八”事变及其影响	(164)
第六章 第三帝国的远东政策与同济大学的兴衰	(176)
第一节 纳粹德国的对华政策	(176)
第二节 德国与同济大学关系的再确定	(182)
第三节 关于同济学生的学历在德国的认可	(186)
第四节 德国与同济大学增设新专业和新学院	(193)
第五节 “八·一三”事变与德国对同济政策的终止	(209)
第七章 德国对华文化政策中的同济德国教师	(233)
第一节 德国教师的人员构成及其聘用	(233)
第二节 德国教师的教育及学术背景	(240)
第三节 关于德国教师来同济工作的动机及其作用	(245)
参考文献	(258)
附录	(270)
附录 1 《德国远东协会与同济校董会协议》	(270)
附录 2 《宝隆医院与同济校董会协议》	(272)
附录 3 《国立同济大学聘任外籍教授规则》	(274)
附录 4 《国立同济大学德籍教授及教员薪俸标准》	(276)
附录 5 同济德国教师简历	(277)
人名索引	(311)
后记	(323)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列强纷纷将目光投向东方，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章 20 世纪初的德国对华政策

本章主要探讨 20 世纪初德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节 从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转变。

19 世纪末德国的外交战略发生了变化，后俾斯麦时代德国欧洲政策的方向性调整直接导致了其世界政策的强化，其后果尤其表现在对华政策上。至 20 世纪初，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双方的正面碰撞加剧，德国作为一个“迟到者”，怀着与列强在中国争夺的强烈意识，以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手段将中国作为其实施世界政策的试验场。

1890 年 3 月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Bismarck, Otto von)辞职。在继任者莱奥·冯·卡普里维(Capriivi, Leo von)执政期间，德国的内外政策开始进行被称之为“新方针”的调整。在外交战略方面，德国首先在结盟问题上发出了转变的信号。俾斯麦曾经竭力维护的联俄防法政策不再受到重视，卡普里维在他的外交部顾问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坦(Holstein, Friedrich von)的建议和影响下，拒绝延长 1887 年德国与俄国签订的为期三年的《再保险条约》。此举导致俄国与法国接近，双方于 1892 年签订军事协定。德国外交政策以德俄同盟的解体为标志进入后俾斯麦时代。

1894 年克洛特维希·霍亨洛厄-谢林侯爵(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Chlodwig Fürst zu)接替卡普里维出任德国首相后，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亲政欲望更为强烈，在不断加强对政府的内政及外交政策进行直接干预的同时，逐步将重大决策权集中于他一人之手。在此后与欧洲大国关系的调整中，德国寻求与英国接近的努力遭到挫折，对英政策开始出现逆转，与英国进行对抗的政策逐步形成。至此，德国完全背离俾斯麦长期维护的“满足政策”和结盟政策，在安全政策上丧失了其原有的稳定和优势。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问题，例如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冲突、国内经济危机、生

产力迅速膨胀引起的社会矛盾,德国最高决策层开始把目光指向欧洲以外的地区,试图以“新方针”为指导,以强权政治和实力政策为后盾,通过侧重世界政策以谋出路,德国的对外政策由此烙上明显的社会帝国主义印记。

德国的世界政策兼具“德国外交政策全球化”的不同方位和内容。第一,在非洲获取殖民地,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谋取军事据点;第二,保持和扩大在南美洲的政治及经济影响;第三,维护和拓展在近东和中东的政治及经济影响;第四,作为世界大国进行张扬^①。卡普里维之后,军方开始在外交战略的决策问题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的外交政策由此形成了外交政策适应军事战略的结构性特点^②。

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以一系列行动将世界政策付诸实施,例如与俄国在中东展开角逐和要求在南非获得更多的殖民利益。19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以“放手政策”开展与其他大国对海外市场和势力范围的争夺^③。德国对外政策中的这一重大变化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中,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出兵侵占胶州湾^④。

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经济界在对华贸易方面没有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除了军事工业由于中国有持续的需求能够与英国竞争外,德国重工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几乎没有进展。进入19世纪90年代,面对长期的通货紧缩和重工业生产过剩,德国经济界和工业界要求政府在对华贸易方面予以支持的呼声不断高涨^⑤。甲午战争后,由于要向日本支付巨额赔款,中国购买德国军火的

① 引自[德]古斯塔夫·施密特:《欧洲帝国主义》,慕尼黑:R.奥尔登堡出版社,1985年(Schmidt, Gustav, *Der europäische Imperialismus*,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85),第67页。

② [德]古斯塔夫·施密特,1985年,第81页。

③ “放手政策”(Politik der freien Hand, Freihandpolitik)是指德国利用英国和俄国在世界范围的争夺而实行一种不受二者牵制的主动的外交政策。参见[德]康拉德·卡尼斯:《1870至1890年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崛起与威胁》,帕德博恩:费迪南德·舍宁出版社,2004年(Canis, Konrad,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1870—1890, Aufstieg und Gefährdung*,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4.),第386页。

④ 关于胶州湾与德国世界政策的关系,参见李乐曾:《胶州湾在德国“世界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第6-9页。

⑤ [德]乌多·拉腾霍夫:《1871至1945年德意志帝国的对华政策:经济-军备-军事》,莱茵河畔博帕德:哈拉德·波尔特出版社,1987年(Ratenhaf, Udo, *Die China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71 bis 1945. Wirtschaft-Rüstung-Militär*,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Verlag, 1987),第126页。

数量急剧下降,德国对华贸易遭受严重打击。经济界在要求政府对此采取行动的同时,明确支持政府在中国建立一个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①。

作为“放手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军事领导层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也开始酝酿采取激进方针。早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海军就企图在中国港口建立海军据点,但德国政府当时并未打算以保护传教士为借口,通过直接出兵达到这一目的。其原因除了俾斯麦保守的殖民政策和“文化斗争”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在保护传教士和发展海军问题上持消极和谨慎的态度。19 世纪 80 年代末,在法国积极扩张在华势力的形势下,德国外交部已要求俾斯麦改变德国以往的对华政策。外交部贸易政策负责人路德维希·拉什道(Raschdau, Ludwig)建议,德国应该像法国那样,把“传教士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手段”^②。

俾斯麦下台后几个月,德国获得在中国对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的“保护权”。如果说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再保险条约》未被延长可以看成是德国以“新方针”代替俾斯麦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结盟政策的前奏,那么德国从法国手中取得“保教权”就是这一重大转变在德国对华政策上的具体表现。它正如拉什道 1891 年 7 月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的那样,今后欧洲大国将更强调各自在日本和中国的利益,而不是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共同利益^③。这预示着德国将直接参与大国在东亚的争夺,而“保教权”为威廉二世在中国进行殖民侵占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借口。

甲午战争及其后果加深了德国在东亚推行其世界政策的紧迫感,三国干涉还辽因此成为德国直接参与和其他大国在这一地区角逐的一个契机。德国与俄、法在远东政策上结为对日三国同盟,标志着威廉二世推行的对华政策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政策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在东亚及对华政策方面,德国有意靠拢俄国,甚至不惜疏远英国,它也因此对欧洲的形势产生了影响。世界

① [德]罗梅君:《“样板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1897 至 1914 年的德中关系》,柏林:学术出版社,1997 年(Leutner, Mechthild,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 bis 1914*.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7.), 第 64 页。

② 转引自[德]霍斯特·格伦德尔:《德国殖民地史》,帕德博恩:费迪南德·舍宁出版社,2000 年(Gründer, Hors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e*,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0.), 第 99 页。

③ 转引自[德]霍斯特·格伦德尔,2000 年,第 99 页。

政策和欧洲政策的这种相互影响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第二,在德国的东亚经济政策方面,中国最终成为关注的中心;第三,在中国获取海军据点的计划引起了德国政界及军界,特别是引起了海军和受海军主义鼓舞的威廉二世的持续关注,并由此成为德国在对华及东亚政策中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①。

由于清政府对德国与俄法两国联手逼迫日本还辽的行动没有投桃报李,德国政府以非武力的手段获取胶州湾的期望落空,实施强行占领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早在1895年5月威廉二世就下令尽快完成在中国获取海军据点的计划,并要求迅速予以实施^②。对德国政府将要展开的行动,霍尔斯坦在1897年发表了明确的意见:“威廉二世皇帝的政府需要在外部获得一个将对内部产生作用的显著成果。这一成果只能指望是一次获胜的欧洲战争,……或者是成功地欧洲以外获取领土。”^③霍尔斯坦的观点清楚地表明,德国政府应不惜通过发动一次对外军事行动来缓解因国内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以社会帝国主义的方式来推行世界政策。但霍尔斯坦同时又指出,欧洲战争将是“一次世界史上的冒险”。因此,德国应竭力避免在欧洲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对内部产生影响”的最可行方案只能是“在欧洲以外获取领土”。德国占领胶州湾正符合这一设想。

因此,与俾斯麦执政时期的以经济扩张、军火出口为主的对华政策不同,威廉二世时代的对华政策带有明显的社会帝国主义特征,胶州湾事件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然而,除了有解决国内矛盾的动机外,德国借口“保护”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出兵占领胶州湾具有更深层次的军事战略和对外战略背景。

由于俾斯麦的“制动器”^④作用,德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在其执政时期发展迟

① [德]罗梅君,1997年,第42-43页。

② [德]罗梅君,1997年,第43页。

③ 转引自[德]赖因哈特·吕鲁普、汉斯-乌尔里希·魏勒尔、格哈德·舒尔茨:《德国史,第三卷,19和20世纪,1815—1945》,哥廷根,1985年(Rürup, Reinhard; Wehler, Hans-Ulrich; Schulz, Gerhard, *Deutsche Geschichte, Band 3. 19. und 20. Jahrhundert. 1815—194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5.),第349页。

④ 转引自[德]霍斯特·格伦德尔,2000年,第60页。

缓。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德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急速发展的阶段,举国上下掀起了海军主义的狂热,建立海上强国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国策。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Tirpitz, Alfred von)是制订德国海军战略和舰队计划的关键人物,而他雄心勃勃的计划显然针对当时的海上霸权英国。蒂尔皮茨强调,“海上军备是”德国“推行的唯一有计划的世界政策”,而“真正的世界政策意义上的自由只有通过建造舰队来实现”^①,为此他要求政府不惜巨额资金建立一支庞大的“风险舰队”。

德国政府以保护传教士为名出兵占领胶州湾,立即获得了以天主教势力为背景的中央党对政府在殖民政策上的原则支持和积极评价,认为这一事件是关系到“德意志祖国经济及政治利益的”一个“有益的行动。”^②事件发生后,中央党对舰队计划的态度发生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变化,1897 年年初该党还拒绝政府的扩建舰队方案,11 月底立即转为支持舰队计划,以此作为对政府保护天主教传教士的回报。帝国议会 1898 年 4 月 10 日和 1900 年 6 月 14 日通过的旨在扩建帝国海军的《第一舰队法》和《第二舰队法》,都因得到大多数中央党议员的赞成以多数票获得通过。很明显,在传教士问题和扩建舰队问题上中央党与威廉二世需要相互利用,而胶州湾事件正是二者进行交易的一个重要筹码。

作为一次“成功地在欧洲以外获取领土”的尝试,德国侵占胶州湾不仅完全符合威廉二世谋求在欧洲以外扩大势力范围、争夺海外市场的世界政策目标,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内掀起的海军主义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接推进了德国舰队计划的实施,而这一计划又是德国最终实现其世界政策战略的极为重要的一环。^③

① 转引自[德]米夏埃尔·弗勒利希:《帝国主义:德国殖民及世界政策 1880—1914》,慕尼黑:德国袖珍本出版社,1994 年(Fröhlich, Michael, *Imperialismus: Deutsche Kolonial- und Weltpolitik. 1880—1914*, München: dtv, 1994.), 第 77-78 页。

② 转引自[德]罗伯特·霍夫曼:《德国政党史,从帝王时期至当代》,慕尼黑:皮泊尔出版公司,1993 年(Hofmann, Rober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arteien. Von der Kaiserzeit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Pieper, 1993.), 第 104 页。

③ 英国的官方文件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于德国占领胶州湾。英国认为,德国就此开始实行积极的世界政策,采取了针对英国的军备政策。参见[德]罗梅君,1997 年,第 44 页。

第二节 “样板殖民地”与“门户开放政策”

胶州湾成为德国的租借地后,德国的“宏观对华政策”^①进入一个调整期。帝国首相、外交部、海军部、驻华外交官和胶澳租借地总督在对华政策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其焦点是:德国应该继续以武力在中国进行扩张,甚至参与列强瓜分中国;还是在维持中国现状的情况下,以胶州湾为基地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和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不同,胶州湾租借地不是由帝国殖民部而是由帝国海军部管理。1897年6月蒂尔皮茨担任海军大臣,他对德国政府胶州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具有重大决策权。根据蒂尔皮茨的设想,德国对胶州湾租借地政策应该与它在非洲以占领土地、攫取资源的殖民政策不同,胶州湾应该建设成为一个贸易殖民地。

对青岛和胶州湾未来的战略目标,蒂尔皮茨与海军军事领导层,特别是与海军司令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蒂尔皮茨重点发展经济的战略成为主导政策,目标之一是将胶州湾确定为德国经济深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门户,并将它建成能与香港竞争的“样板殖民地”^②。蒂尔皮茨试图以此为他的海军战略提供一个范例,即只有建设强大的海军舰队,才能保障德国的世界贸易和海外市场。为此,德国为青岛殖民地的基本建设作了长期规划,投入了大量资金^③,对青岛军事设施的建设则因资金短缺被延迟^④。

通过对胶澳租借地的建设和对山东筑路权及开矿权的争夺,这一时期德国

① 按照德国学者维尔纳·斯丁格斯的解释,“宏观中国政策”(Große Chinapolitik)是指列强在近代国际冲突中对中国作整体的观察,并为其扩张提供框架条件;“微观中国政策”(Kleine Chinapolitik)是指列强在中国扩张的具体实施。参见[德]维尔纳·斯丁格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政治中的远东(1902—1914)》,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格+赫尔欣出版社,1978年(Stingl, Werner, *Der Ferne Osten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1902—1914), Frankfurt/M.: Haag und Herchen Verlag, 1978.),第706-707页;[德]罗梅君:《德—中关系,1911—1927,从殖民主义到“相互平等”》,柏林:学术出版社,2006年(Leutner, Mechthild,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11—1927, Vom Kolonialismus zur „Gleichberechtig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6.),第61页。

② 转引自[德]米夏埃尔·弗勒利希,1994年,第43页。

③ 1913/14年度,德国政府为青岛提供的补贴资金就高达1030万马克。[德]米夏埃尔·弗勒利希,1994年,第43页。

④ [德]维尔纳·斯丁格斯,1978年,第434页。

对华政策以“势力范围政策”为主要特征,其重心开始向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倾斜。1898 年 9 月 2 日,德国宣布向各国开放青岛港,使该港成为自由港。1899 年 7 月 1 日,青岛海关(胶海关)开关。蒂尔皮茨多次强调胶州湾的经济地位在德国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在一封给威廉二世的信中,他严厉批评了第一任德国驻胶澳总督卡尔·罗森达尔(Rosendahl, Carl)无视应优先对青岛进行经济建设的做法,并要求撤换罗森达尔^①。

1899 及 1900 年胶州湾德国驻军对日照和高密民众的镇压和蒂尔皮茨对此做出的反应,同样暴露了德国内部对如何控制在山东扩张势力范围的界限及手段存在分歧^②。日照教案和高密事件的始作俑者,胶澳总督保罗·耶世克(Jaeschke, Paul)和驻华公使埃德蒙德·冯·海靖(Heyking, Edmund, Freiherr von)都主张不惜动用武力实现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扩张,包括对传教士的保护。海靖之后的驻华公使克莱门斯·冯·克林德(Kettler, Clemens von)和施瓦岑斯坦·冯·穆默(Mumm von Schwarzenstein, Alfons Freiherr)也和其前任一脉相承^③。对此,蒂尔皮茨明确表示反对。日照事件发生后,蒂尔皮茨批评胶澳总督耶世克对日照用兵缺乏理由,他担心德国人与当地中国人的暴力冲突的升级会危害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他赞成的“和平扩张”计划。蒂尔皮茨认为“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首先使用一切外交手段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从国际法的立场出发这在政治上是明智的。”为此,蒂尔皮茨禁止耶世克继续采取类似的行动,他同时还提出警告,手段越严厉,招致的反抗只会越强烈^④。

① 帝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致皇帝威廉二世函(1898 年 10 月 7 日),引自[德]罗梅君,1997 年,第 352 页。

② 1898 年 11 月,日照民众与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及教徒发生反洋教冲突,1899 年德国出兵进入当地弹压,造成伤亡,此事件被称为“日照教案”。1899 年 6 月德国修筑胶济铁路时,因强占土地民房与高密民众发生冲突,德国出兵镇压,造成当地民众 20 多人死亡,此事件被称为“高密事件”。

③ 穆默 1900 至 1906 年任德国驻华公使,在任职后期转而建议贸易应成为德国东亚政策的唯一目标,主张德国应坚持“门户开放”政策,放弃在胶州湾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建设,撤回驻扎在中国北方的德军。参见[德]尼尔斯·佩特松:《帝国主义与现代化,暹罗、中国与欧洲列强,1895—1914》,慕尼黑:R. 奥尔登堡尔克出版社,2000 年(Petersson, Niels P., *Imper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 Siam, China und die europäischen Mächte. 1895—1914*,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2000.),第 211-213 页。

④ 帝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致胶澳总督耶世克函(1899 年 6 月 27 日),引自[德]罗梅君,1997 年,第 25, 241, 270, 273 页。